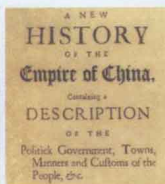




世界的中国
SHIJE DE ZHONGGUO

清代宫廷中的 外国人



◇ 余三乐 著 ◇



中华书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界的中国
SHIJI DE ZHONGGUO

清代宫廷中的 外国人

余三乐 著



中华书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宫廷中的外国人/余三乐著. -北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

(文史中国)

ISBN 978-7-101-07061-3

I. 清… II. 余… III. 人物-生平事迹-外国-近代-青少年读物 IV. K812.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268 号

-
- | | |
|-------|--|
| 书 名 | 清代宫廷中的外国人 |
| 著 者 | 余三乐 |
| 丛 书 名 | 文史中国 |
| 责任编辑 | 吕 健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 200020)
http://www.guji.com.cn
E-mail:guji@guji.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½ 字数 50 千字 |
| 印 数 | 1-6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7061-3 |
| 定 价 | 14.00 元 |
-

重庆市图书馆

惠存

余三集

二〇一〇·十二

《文史中国》丛书 出版缘起

《文史中国》丛书的策划编撰，始于2004年。

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了一项重大的文化战略：“对未成年人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教育”，要求通过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悠久历史的教育学习，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有鉴于此，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南北两家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著名出版社——决定联手合作，出版一套为青少年量身度制的高质量的传统文化系列图书，其初命名为《长城丛书》，计16个系列、约160种图书。计划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快列入了“‘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

2005年，中宣部策划组织的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点出版工程——“民族精神史诗”全面展开。《长城丛书》之“文史知识”部分，又被吸纳为这项重大文化工程之一，并以《文史中国》为名，正式启动。经过近五年时间、数十位



学者的倾情投入，其第一批成果，终于以清新靓丽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有别于以往的传统文化读物，《文史中国》的宗旨可概括为一句话：题材是传统的，眼界是当代的。因此除了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统一的常规标准外，丛书从选目到撰写，更要求以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视域来透析中华文化的深深刻意蕴。而“中华”与“上古”深厚的学术底气与近十年来的创新精神，正是践行这一宗旨的可靠保证。

《文史中国》丛书首批共38本，分为四个系列：“辉煌时代”、“世界的中国”、“文化简史”、“中华意象”。四个系列互相联系，同时又自成体系，为读者多视角多侧面地展示中华文明。

“辉煌时代”系列共10本，选择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十个辉煌的时代，作横断面的介绍与分析，以显示开放心态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振兴的主体精神。

“世界的中国”系列共10本，集中表现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展现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组成部分，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共荣、和谐共处是中华文化的固有精神。

“文化简史”系列共10本，从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各部类

入手，历时性地介绍中国人知行合一的生活情趣，高尚优雅的审美理念，以及传承有序、丰富多姿的文化积累，从而为当代人的生活文化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启示。

“中华意象”系列共8本，选取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思想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进行深入的解析。“龙凤”“金玉”等意象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它们以其特有的形象和意涵，展示着中国人特有的精神世界，并丰富着全人类的文化符号。

全中国的中小学生、全世界的华人学子，是《文史中国》丛书的当然读者。我们期待着读者们在清新优美的文字和图文并茂的情境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爱国、团结、和谐、奋斗”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成为一个出色的中国人。

今后，无论您走到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无论您从事哪一项职业，无论您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您都可以骄傲地大声说：

“是的，我是中国人！”

中华书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7月

引 言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时期。作为明清两代都城的北京，在大约两个世纪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时期起始于1601年利玛窦的进京，而中止于18世纪末年耶稣会的被解散。

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存在无疑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特点和前提，这一点在明清两代又有所不同。虽然利玛窦在进呈给万历皇帝的第一份奏折中，就婉转地表示愿意参与修订中国的历法，然而直到他辞世也没有获得这一机会。但是，利玛窦毕竟为此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第一，他已经开创了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文化适应”和“科学传教”的策略，这使他的继承人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耸立着“万里长城”的封闭的中国，在都城北京定居，并参与中国朝廷的观天、修历等多项包括科学、艺术诸多门类的活动；第二，他已经以先进的欧洲科学征服了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开明的中国学者，使他们深切地认识到“西洋新法”是破解中国传统历法困境的唯一途径，并为实现这一变革奔走呼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里的“东风”指的是时间和机缘。

对于自认文化优越和将历法视为权力象征的中国来说，采用从未听说过的西洋的方法，延揽西洋人来修订历法，必然是一个不容易跨越的台阶。然而，传统中国历法的谬误又是无法回避的，官方预测的日食月食屡屡出错势必动摇皇帝作为“上天之子”的权威性。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629年，也就是利玛

窦上奏万历皇帝的近三十年之后，崇祯皇帝同意开设“历局”，由徐光启领衔，采用西法，延揽西士，修订新的历法。当时参与其事的外国传教士有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和汤若望。但“历局”还不属于“宫廷”，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

外国人进入宫廷要从清代定鼎北京开始，这就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第一位进入清宫廷的是德国人汤若望。

目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清廷钦天监的掌印官——汤若望	1
第二章 西洋帝师——南怀仁	19
第三章 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白晋和张诚	37
第四章 音乐家徐日升和他的外交使命	45
第五章 纪理安和他创建的宫廷玻璃作坊	59
第六章 供职钦天监近三十年的耶稣会士——戴进贤	65
第七章 宫廷画师——郎世宁和王致诚	73
第八章 西方传教士与《皇舆全览图》	85
第九章 中学西传的使者	93
深入阅读	101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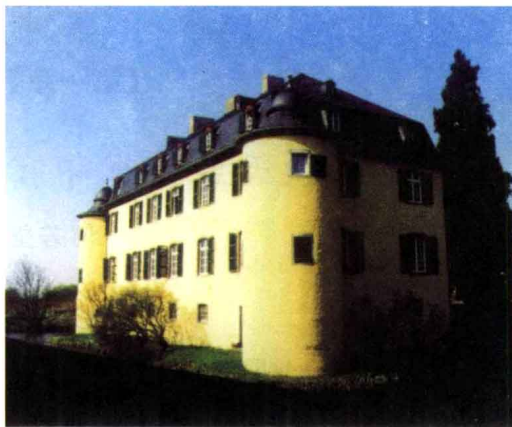
清廷钦天监的掌印官

——汤若望

汤若望，字道未，原名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年5月1日诞生于莱茵河畔古城科隆一个笃信天主教的贵族家庭。汤若望在家族位于吕符腾堡的庄园度过幼年时光，并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生活也是在耶稣会创办的学校中度过的，毕业后他被选送进天主教的高等学府——设在意大利的德意志学院。1608年，17岁的他就离开家庭，到罗马先后攻读哲学、神学、天文学和数学，前后共4年。他和邓玉函、罗雅谷都是灵采研究院的院士。1611年，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1617年升任神父。

在罗马，年轻的汤若望与当年的利玛窦一样，被来自中国的消息强烈地吸引着。特别是利玛窦在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功，向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士展现了大有作为的前程。1614年，从中国回欧洲的耶稣会士金尼阁在罗马作了有关中国的极为精彩的报告，这更激起了汤若望对这一位于遥远东方的神秘国度的浓厚兴趣。所以当金尼阁邀请他作为随员同赴中国的时候，他欣然接受，向耶稣会总会长递交了申请书。不久，他的申请获得批准，在神学院的名册中他的名字下，写下了“将去中国”的庄严选择。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汤若望与金尼阁、邓玉函、罗雅谷等人一道，踏上了以澳门为目的地的漫长旅程。

当他们一行人到达中国的时候，正值“南京教案”爆发期间，



汤若望故居，位于德国吕符腾堡



1992年德国为纪念汤若望诞辰400周年而作的石雕，位于科隆的一座小教堂旁

汤若望就在澳门认真学习汉语，为进入内地传教积极做准备。1622年（天启二年），明朝廷为了抵御满清八旗而求助于西洋大炮，于是取消了先前对教会的禁令。汤若望才得以辗转广东、江西、浙江等省，次年进入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在北京期间，汤若望继续刻苦学习汉语，并开始试着测算日食和月食。他将从欧洲带来的有关数理和天文学书籍的目录呈献给朝廷，还在自己的住所（即今之宣武门教堂，又称“南堂”）陈列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请中国官员和学者们参观。就在那段时间，他结识了徐光启、王徵等。1627年（天启七年）春夏之交，他奉命前往陕西传教。在那里他撰写了介绍望远镜的《远镜说》。

1630年（崇祯三年），在历局供事的邓玉函不幸去世，主持改历工作的徐光启急需精通天文学的人才，于5月16日为此专门奏上《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崇祯皇帝三天后就批示曰：“历法方在改修，汤若望等即可访用，着地方官资给前来。”（《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第345页）在历局，汤若望发挥他善于制作和使用望远镜的特长，指导历局人员观测天象。1634年（崇



今日南堂



汤若望像

祯七年），汤若望先后向皇帝进献了望远镜、天体仪、半面球形图及水平日晷等仪器；并为朝廷制造了其他许多仪器，譬如象牙制小日晷、望远镜、圆规、小号天体仪、星高机等物（据当代学者伊世同先生考证，现存于雍和宫的三件仪器——天球仪和日晷等均出自汤若望之手）。1639年（崇祯十二年）1月6日，即中国传统春节的前夕，皇帝把御笔题写的“钦褒天学”的匾额赐给了南堂，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不久以后，礼部也向汤若望和罗雅谷二人专门赠送了一块匾牌，上题“功堪羲和”。羲和是古代传说中掌管历法的官员。

当然在历局供职14年的汤若望的最大成就，还要算参与并最终完成了《崇祯历书》。《崇祯历书》是一部卷帙浩瀚的天文历法百科全书，总计137卷。先后有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汤若望等参与其事。这部巨著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学者与西洋传教士共同智慧的结晶。但是徐光启、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在还没看到最后成功时，就撒手尘寰了（龙华民则是中途放弃）。最终完成这部巨著的是汤若望。这就



像一场接力赛，跑最后一棒的是汤若望。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古都北京也三易其主，经历了两次改朝换代的动荡和混乱。这一形势下，在京的耶稣会士何去何从？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会长龙华民看到，曾经善待耶稣会士的崇祯皇帝死了，北京落入农民军之手，教会的前途未卜，就和傅泛济等一道离开了这危险之地。他也劝汤若望随之离京南下，但是汤若望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留在北京，守护南堂。

汤若望之所以做出这一不同寻常的选择，是因为他洞察中国社会发生的急骤变化，预感到一个新旧交替时刻的到来，并不觉得是什么大难临头。他曾经说：“如果这个皇帝不在了会再来一个，对我们也许比他更好。”（转引自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4页）

李自成的队伍因山海关的战败而退出北京，混乱的局势持续了一个多月。当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袞率部进入北京时，已经饱受动乱之苦的北京居民对清军表示了欢迎。但是第二天多尔袞就颁布了一道严重伤害北京市民的命令。他勒令原在北京内城居住的汉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到外城，内城地区统统让给满人居住。

耶稣会士的南堂，处于内城的最南边，也属于迁出之列。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教授魏若望神父分析道：“对于汤若望而言，这意味着耶稣会的住所及其他财产将有丧失的可能。他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天主教在首都北京的继续存在将面临危险。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已经建了一座教堂、一间礼拜堂和一处颇具规模的、收集了大量宗教书籍、图画和包括了数学、天文学的多卷本丛书的图书馆。如果他以后继续为改进中国历书而工作的话，他是绝对需要这些文献书籍的。”（《汤若望与明清变迁》，《汉学研究》，第七集，中华书局

2002年出版，第219页)

于是汤若望立即写了一份奏折。其中写道：

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东来，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阐扬天主圣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臣自构天主堂一所，朝夕虔修，祈求普佑。作宾于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板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象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夥。若欲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其测量仪器，由西洋带来者居多。倘一损伤，修整既非容易，购办又非可随时寄来。特为沥情具折，恳请皇上恩赐，臣与同伴诸远臣龙华民等，仍居原寓，照旧虔修。《《正教奉褒》，《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483页)

一日，汤若望身着中国平民服装，径自来到皇宫门前呈递奏折。那里还有很多类似的请愿民众，汤若望和他们一起跪下。但是别人都被士兵用皮鞭赶走，唯有他得到了一位高官的接见。这位高官就是范文程。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岳，辽东沈阳卫（今沈阳市）人，系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的后裔。他18岁时中秀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自愿投效努尔哈赤，参加后金政权，成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主要谋士之一。世祖顺治皇帝即位后，他向摄政王多尔袞进言：“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清史稿》，卷232，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第9352页）当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消息传来，正在养病的范文程立即向多尔袞建言进军中原。他同时建议清军改变以往滥杀汉人的政策：“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清史稿》，卷232，第9352页）多尔袞采纳了他的建议，



联合明军降将吴三桂，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此后，范文程一直在最高决策层发挥关键性作用。康熙五年八月，范文程病逝，享年七十。康熙皇帝御书“元辅高风”，以资褒奖。

笔者在此扼要地介绍范文程的生平政绩，并非赘言。他是汉人，但却能破除传统的“华夷”偏见，而辅佐一个虽然带有浓重的落后意识，却是新兴的、生气勃勃的非汉族政权。他不失时机地建议清军挺进中原，建立新朝；而同时他又尽力使这些外族统治者接受汉族文化，改变他们的落后意识，从而使中原汉人少受残害。范文程是当时清王朝统治核心中少有的（如果不是说“绝无仅有”的话）能够高瞻远瞩、海纳百川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开明学者。他能够敏锐地认识到汤若望的才华对刚刚创建的王朝所具有的宝贵价值。正如当年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会面开创了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一样，汤若望与范文程的会面则开创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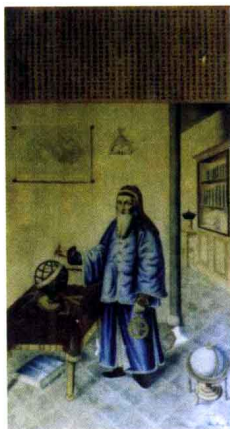
当时范文程命汤若望走上前来，接过他的奏折，并询问了有关教堂和观天治历等工作，然后就让汤神父暂且回家，第二天再来听候批复。

汤若望还没到家，就已经有两位官员来到教堂核查奏疏中所谈到的情况是否属实。第二天汤若望便领到了一份谕旨：“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转引自《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就这样，教堂中几千卷欧洲书籍以及印刷有关天文历算的中文书籍的木版，全部保存完好，未受丝毫损毁。

当时呈现给大清新朝的历书也有两种版本。

原明王朝钦天监的官员也都归顺新朝。他们将原来的皇历改头换面，添加上新朝的标签献给摄政王多尔袞。摄政王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书，他们回答，是流行的中国皇历。对此了如指掌的摄

政王不客气地说：“这种舛错百出的历书，这上面的报告预测，既不能上合天象，又不能下应地事，是要不得的。一位名汤若望的欧洲人曾制有较佳的历书，这一种历书是应当行用的。你们从速把这个人唤来。”〔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第235页）看来，清王朝的统治者知道当时存在着两种历法，根据这不同的方法编纂了两种不同的历书。他们比明崇祯皇帝来得果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决断，除旧布新，采用西法。



汤若望像

6月的一天，清王朝的一位高官将汤若望召进了皇宫，向他询问天文和数学问题及两种不同的历书的情况。汤若望指出了原钦天监的旧式历书的七大错误，并报告说，他已经完成了第二年，即1645年的新式历书的编纂工作，敬请朝廷颁布施行。

于是，正在寻求一本新历书作为新王朝标志的清朝统治者，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汤若望。这年的8月2日（七月初一日）多尔袞在礼部的奏折上批道：“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诚为大典，宜名‘时宪历’。”“自明岁顺治二年为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第66页）并在历书上批下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字（南怀仁称：“汤若望初进历时，历面上原无‘依西洋新法’字样。此五字者，乃内院大学士奉上传批在原本历面上，发与礼部颁行。”引自南怀仁《不得已辩》，吴相湘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本天主教东传文献》，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出版，第348页）。在明王朝数十年争论不休的事情，终于在新兴的清王朝中仅仅几个月就尘埃落定了。